

# 杜维明：从“坎陷”到“扩大”

杜维明 精神人文主义 Spiritual Humanism 阅读量：584

## 心学的文化与政治含义（下）

**导读：**恻隐之心、良知及其推扩，对天的内向化理解，对人的非归约化的认识……这些内容都建基于儒学对心的性质和潜能的理解。心的良知绝不局限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道德意识，而是本身具有一套宇宙论和本体论，并且自有向外推扩的要求和肌理。同时，儒家对人的这些探索是非教条的、多元的、包容的，这也就使得在 21 世纪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对话的背景下，儒家的价值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获得认同，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 二. 恻隐之心与儒学复兴

#### 1 恻隐与推扩

恻隐，也叫做“同情”。现在有些科学家在研究同情心在儿童中的产生，以前很多的心理学家认为儿童在两岁的时候开始有同情心，最近有一些英国心理学家认为几个月小孩就开始有了。当然，从同情到具体的行为之间，有很多复杂的问题要加以解决。于是“推”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人的本性中有内在的情，人的价值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显现，但是不可以自觉地加以体现，能“三月不违 仁”，这就需要有一个自我修养的过程。

人的本性，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要通过学习的。人的特色在于何？就是人的情和义，这没有什么可争议。当然，所有动物也都有情，但人的情有最特别之处，如果从孟学来说的话，就是“仁爱”。“仁”就是建构在恻隐之上，经由推扩，最终达到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之所以成为人，最珍贵的，就在于他们有大体。孟子说道“良贵”，其贵也是贵在这里。

“恻隐之心”能不能面对现在复杂的社会？现在道德哲学的研究深化了，研究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道德理念，是怎么从演化论发展出来，开始是生物，到动物再到人，这个进化的过程，现在是不是已经基本上变了，至少在道德哲学上来考虑的很少。如果不是，那么人的出现，如果使你出现的那些条件之中有一个质的变化，会怎样。以前都不太关注人的动物性方面，比如孟子所说“人之去禽兽也几希”，而现在学术界对人的生物性方面的理解是越来越强，比如哈佛有一个研究计划，研究心和脑的问题，从科学主义来讲脑的问题，解决心的问题。脑的领域的扩大，意味着心的领域在缩小。

#### 2 作为创造性支撑的“天”

另外，是不是广义的自然主义能够使得“天”成为不必要的范畴？如果要有这个“天”，是不是就和西方的上帝相接近？我的感觉是这样，“天”的一种对应说法就是创造性的支撑，这个创造性的支撑，如古代中国传统的“畏天”、“敬天”，所以不仅是有创造性的自我，而且它是价值之源，所有的价值之源。从人类的信仰来看，“天”的创造性是不可比的，我们人还是太渺小了。从进化论来看，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最大的破坏者，我们以前总以为人是进化过程中的产物，现在我们直接参与这个过程

了，这有可能导致问题不断出现，使得动物、植物、生物、水源、土壤甚至空气都受到了极大的干扰。

当然，“天”也不是西方的上帝。西方所讲的上帝太实在了，是完全绝对普遍的存在且超出于被造物之上，儒家在这方面则与之不同，基督教是不能包容的，不管你怎么去做比较，“天”与上帝还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轴心文明的时代，除了一般所谓的超越和突破以外，还存在有一种反思（因为超越和突破可能太局限了，只是讲上帝或者上帝的出现），一种自我反思，或者说反思的反思。在孔子那个时代，儒家的特性就是对何为人的问题做了一个深层的反思。这个反思是在人的世界之中进行的，而不是以超越而外在的上帝为前提所发展出来的一套理念。我就顺着这套理念面对 21 世纪，它有它的特殊性，它的特殊性也可能是它的优越性。

### 3 从“坎陷”到“扩大”

五四的那一代人有很深的情结，就是启蒙心态。一个伟大的民族若不能发展出科学，他的存在就有问题，现代性就有问题，要成为现代人所接受的一套理念就有问题。但是大家想想，我们从来没有要求基督教开出民主科学，现在世界上大概有 10 亿人是天主教徒，而梵蒂冈最不民主，在很多地方也最不科学，这样一个系统却没有开出民主开出科学的压力。那么在中国思想界，在当时牟先生那一代，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愿，一定要在这个环境开出民主科学，不开出的话你的价值本身就有问题，讲良知通过坎陷的方式开出知性，从道德理念开出知性。我的观点则是，我们不要把良知或者德性之知只看成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道德意识。良知的范围太宽了，有宇宙论、本体论的观念，王阳明《大学问》所体现的精神，一方面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另一方面，有一个“推”的过程，推的过程表示我们都是人文世界当中的一部分，同时要有分疏，不能如墨家的“兼爱”，对路人的父母亲和对自我的父母亲一样。儒家认为兼爱是不现实的。要一步一步慢慢地“推”。有些人喜欢飞跃，特别爱他的狗和猫，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却不闻不问，这是怎样一种人？所以对整个社会文明教育来看，“推”更有正面的意义。

如果说良知经过坎陷才能开出新的科学理念，而靠良知扩大展开出新知识是有问题的，那么在表达这个观点时已经有了一个先在的判断或者前理解：良知是老的，怎么开出新的。我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以前的诸先生讲的内圣就是老的内圣，要从老的内圣开出科学理性。但到底什么是科学理性，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理性本身就是复杂的。早期人们认为物理主义的理性就是科学理性，把所有的都归为物理才是实在的。但现在接受物理理性的人越来越少了。良知通过坎陷而导致知性主体出现，是代表一个不能被良知、道德理性所限制住的，一种新的认识论上面的新的价值和方式。但是如果走良知扩展的路子，也就是承认我们的良知不仅有道德理性，还有人文学、社会学的认知，也有体证的认知，也有科学理论的认知。那么这便是 20 世纪对知的新理解。从这个方面来讲，所谓扩大的意思不是量的扩大，而是对它做更深层的理解，对他所碰到的困难进行更深层的反思。

### 4 社会的、历史的、追求意义的人

中国传统非常强调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因素，可是在政治学的层面，心性之学还体现出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强调有权有势的精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从这样的责任里面可能发展出一套和实际的人权有关系的论说，但是又不是现有人权论说的一部分。有的学者还说，我们讨论“天命之谓性”讨论得很多，这个和人人平等的观念有何联系，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另外，我刚才说**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责任问题**，它跟“礼”有什么关系，我们说政治的“礼化”，在现代其现实意义是什么？有人把“礼”作为传统东亚社会起调控性作用的一个基本机制，因为作为一个调控系统，甚至有学者认为它跟西方的宪法主义是完全配合的，也就是中国传统的“礼”和“法”，礼的范围远远要超出我们一般理解的礼仪，现在的文化习俗很大一部分在中国过去是属于礼的范围。

如果人既是感情的动物，又是社会的动物、历史的动物、追求意义的动物，那么这个**历时性**怎样表现出来？我们一般谈得最多的与历时性切实相关的就是传宗接代，传宗接代的问题不要单从现实来看，它还有价值传承的意义，一代一代地传承和发展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特别是母亲的身教又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也可以成为我们与女性主义对话的课题。

另外，我们谈到**追求意义**的问题，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它追求的意义和“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像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王阳明所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这一类观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是创造财富不可或缺的机制。但是当市场经济变成市场社会，每一个领域，包括宗教也完全被市场化、商业化、物质化了。很多很多宗教，特别是本土的宗教，它的精神性受到很大的减杀。许多宗教的团体，不是一般的宗教信仰集团，而成为一个牟利的集团，有很多跟宗教没有关系的考虑。如现在的基督教，也是既保持着纯净性的一部分，同时还有现实的、功利的一面，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 5 儒学的普世价值与文化认同

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之下，因为经济、政治的各种原因，我觉得**儒学尚不要说建构，而是要考虑文化认同的问题**。现在国内各种不同的思潮之间，形成重叠的共识力量不是很大，各种不同的思潮有各种不同的方向。从我 1980 年代回大陆到现在，我感觉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广义的传统文化，特别要包括民间文化）在经历复兴和重新起步，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我自己感觉到，中国文化在近代以来受到极大的摧残，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每 10 年有很大的变化。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每 5 年有很大的变化，这些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认为现在中国文化有病，需要治理。治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治疗，另一种是调养元气。后者当然更重要。元气足够的话，即使病了，恢复的可能性很大。元气不够，即使不病，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病以后就会不可收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整个文化的复兴是一种为中国文化建构最低的底蕴，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但这工作是非常艰巨的，可以从读经开始，让年轻人重新了解经书，重新了解自己的文化，让大学生至少不再排斥中国的古典。希望以前在精英大学理直气壮念英文、考托福，完全看不起读古典的风气能够反过来。在五四时代真正反传统非常激烈的人很少，所以反传统的风气很短时间内扭转

过来了。现在有没有很快扭转风气的可能性，我认为也许不很大，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

对儒学的复兴，要从几个范围分别来看：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学术，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媒体，再加上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和组织，各种不同的专业，另外，横向的沟通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基本的理解是，不管你的思想是左、中、右，重新开发传统资源已经形成共识。有极少数的人，认为中医是伪科学，抱有强烈的、非常狭隘的甚至过时的科学主义。但是它的说服力非常小，可以靠各种不同的其他力量来使它维持。在重新发掘传统资源使文化底蕴从薄到厚，这个过渡是非常不容易的。心学能够做的工作，不是简单地拨乱反正，而是要回到民族文化中间，不是说像晚明时期，很多王学的传人有很大的影响力，成为一个社会运动，心学突然一下子大发展，这完全不是我想象的。

心学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心学的儒家精神性最强，现在这个精神性的恢复，要有一种聚焦。因为心学处理了很多问题，包括功利的问题、物质的问题、志向的问题、终极关怀的问题、人最高理想的问题等人文精神中最能够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处理了，而且中间的资源是很深厚的。我记得以前傅斯年做台湾大学的校长，选择《孟子》作大一国文教材，他说没有念过《孟子》的，不配做台大人。可惜他去世很早，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现代人对于传统，还有很多疑虑或是反感以及由反感造成的抗拒，因为抗拒而完全的忽视：幸好对传统文化的复兴的这些负面因素逐渐在减少，以前我说一阳来复，现在可能是否极泰来的过程：

我们现在常常用软实力说中国的模式，这些我觉得可能讲得太快，自信心太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兴起，受到最大的阻力或者是曲折、异化，就是成为一种比较狭隘、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我觉得真正的能够在将来发展所谓软实力，就是我们的价值为其他人所接受，而且是心悦诚服地接受。现在我们心悦诚服地接受是民主、人权、科学、法制、个人的尊严，表示西方的软实力特别壮大，已经成为我们的价值体系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什么时候仁义礼智信也能够这样？**我认为仁义礼智信没有一点不是普世价值.但是它是扎根在儒家传统的普世价值中，或与扎根在西方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可以对话。**美国希望能够学习和能够参照的，和中国需要学习和参照的，现在重叠的共识越来越多了。普世价值的对话虽然现在没有，但远远要比贸易、军事、人民币升值、空气污染这种类型的博弈和对话重要得多。因为现在世界对中国最大的怀疑不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力，而是对中国的文化有所疑惑，不知道这一批人的素质是什么.他心里面真正想的是什么，是想要为发财而发财，或者是有更高的理想，更宽的视野。我相信心学与建立核心价值，与这种类型的文明对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 三. 多元宗教与对话精神

#### 1 21 世纪的人文主义

现在我想谈一谈面对 21 世纪人进行自我反思时不得不面对的几个大问题。

第一，何为人的问题；

第二，我们如何能够知、行的问题；

第三，我们能够希望什么？

21 世纪，我们需要有一种全面而且具有整合力量的人文精神的出现，而各个不同的传统都应该对人文精神的体现作出积极的回响。我认为，一种具有整合力量的人文精神是开放的、多元的，且自我反思能力比较强，绝对不是现在哪种文化传统一枝独秀就可以统合其他文化传统。经过我最近这几年和世界各国不同人的对话，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对话，特别是文明的对话，要经过几个基本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对他者能够容忍，双方要互相承认、熟悉对方的存在；然后大家互相尊重，有了尊重才有可能互相参照；有了参照才能够互相学习，如果说，中美将来要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我相信对话是必要的，而且对话必须要经过这几个方面。现在中美的对话，如在军事、贸易、人民币升值问题，还有生态环保等问题上，主要从博弈的角度来处理两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是远远不够的。

21 世纪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什么样的类型？我的对话经验使我感觉到，在轴心文明开始发展的时候，有些人认为是最大缺陷的东西，现在却可能会成为各种不同文明对话的最珍贵的资源。当时所谓的缺陷，就是在轴心文明发展之时，一个超越和外在的最高价值的出现，就是关于梵天、上帝的出现，后来发展出关于阿拉伯的出现，这是中西文明的特性，有些学者称为“超越的突破”。没有“超越的突破”，表示轴心文明的工作还没有发展具足。七大轴心文明中的儒家文明，其超越和突破最不明显，所以很多人提出儒家是否应成为轴心文明当中七大文明之一，值得怀疑。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儒家目前的局限性更突出。儒家的宗教性不强，它和现实政治有妥协，没有办法发展它的宗教信仰，没有出现上帝的观念，因此在人人平等、法治以及在民主政治、人类的权力各方面，能不能建构，人的尊严能不能够建构，这些和儒家没有真正的超越有关联，我们一直考虑的儒家跟中国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都和这个相关联。

## 2 “儒家式”的意义与价值

可是儒家和其他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开始我对这个现象很好奇，但是并没有觉得它有深刻的意义，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它很重要，有很深刻的哲学内涵，对儒家的特殊性有一种参照意义。现代与儒家对话最多的是基督教，大家都非常熟悉，出现了波士顿儒家，有一批基督徒认同儒家价值，因此他说自己是儒家。后来就是与伊斯兰的对话。中国文明非常深厚，我们最近才了解到 17 世纪、18 世纪的时候，出了几个很伟大的伊斯兰神学家、哲学家，如马柱、刘智等，他们说自己是回儒，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儒家。佛教从太虚开始也关注社会，太虚讲人生佛教，不讲死的问题；印顺提出人间佛教；到了证言、星云、圣严则提出人间净土的思想。泰国、印度等地的佛教徒很多直接参与社会。最近我有个博士研究生还专门研究儒家和犹太教的对话，其中有一位学生的论文就是《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儒家式的以色列人》。

这些现象的出现，我觉得儒家很重要，“我可以成为一个苏格拉底式的基督徒”，马塞尔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这种例子很多。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儒家式”的和“非儒家式”的分别在哪里？所谓“儒家式”的，一般认为大概有以下几个特性：一是关切政治，二是参与社会，另外一个特性是注重文化。基督教则有所不同，基督徒最重视的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灵修关系，对前面提到的儒家的三个关注点完全可以没有兴趣，基督徒认为个人可以只在修道院进行灵修，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也都有这样的看法，大家肯定非常熟悉。

“儒家式”的这样一个观点，其价值和意义在什么地方？我提出了比较大胆的一个说法，我们将它理解成是一个跨文化、超时代、以各种学科继续不断发展的一个精神文明。与世界三大宗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相比，儒家没有创始者，就是从“我”开始，传承就出来了。我们不能想象没有释迦牟尼的佛教。但是我们不但可以，且必须要接受，在孔子之前，很长时期甚至上千年，也有儒家所向往的圣王。孔子不是儒家的创始者，而且也不是儒家最大的体现，他没有得位行志。虽然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我们毫无疑问地接受孔子是人格的最高体现，他的不得志，是时代对不起他，不是他对不起时代。

儒家没有教条，但并非没有定义。任何人物、观点、制度都可以质疑，都可以挑战、你再质疑、挑战、否定，并不表示这个儒家论说就被解构了，也不表示你不属于儒家传统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在 21 世纪，所有重要的精神文明，特别是所谓三大文明，都经过了一个彻底的转向，这个彻底的转向有些神学家并没有理解到：这个彻底的转向就是，它独特的、自己的宗教语言已经不够了。如果仅仅有专属自己的语言，就不能够和其他的宗教语言进行简简单单的互相沟通，所以必须要对话。对话是非常艰难的，往往对话会造成非常大的冲突，基督的语言，不管是玛利亚、复活，还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每一个观点都有人在讨论，这些是所有基督教的基本理论、基本教条。佛教讲空，讲涅槃，讲轮回，讲法，还有伊斯兰的理论，所有的这些宗教传统面对现实一大考验——人的存活问题，人如何和自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不能把自然当做他者、当做可以消遣的甚至完全不顾自然的神圣性，凭强烈的科学主义去宰制自然。科学主义一度很盛行，与之相联系的便是征服自然的观念。但自然的不可消解性、神圣性是人存活的必要条件的观点，被大范围地接受了。举个例子，现在的基督教信仰者不会说我们只等待未来的上帝、未来的天堂，现在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撒旦的世界而去污染，一个佛教徒也不能说我们的目标是在彼岸，现在这个世界根本就是红尘，不需要照顾它。每一个在轴心文明里有超越的大突破，都有一个新的认识。各个文明除了保有自己特殊的语言之外，还发明了一种全球意义的语言，这就是全球公用的语言、世界公民的语言，我们可以用很多证据来表明我们进入了第二个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在 1948 年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说影响世界最重要的改革人物是苏格拉底、释迦牟尼等。但那时没有提出“第二个轴心时代”问题；现在是 2010 年，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简单地把这几个重要的代表轴心文明的人物拿出来，将之作为未来能够代表人存活的基本的典范人物。

### 3 多元宗教对话的方向

多元的宗教之间不仅没有冲突,而且可以互相渗透、互相参照。作为一个佛教徒,同时他也可以了解儒学,也可以认同道家,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在整个儒家的文明圈都有这个现象,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儒佛道是一根而发的三大宗教。印度也一样,她的多元性、精神性非常厚实,各种不同的宗教都可以宽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再加上这几个教派中间的各种不同的分支。但是与儒家文化圈和印度文明地区不同,比如基督教,基督教的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矛盾冲突长时间就没法解决。现在我们需要在这些宗教传统之外,有一个世界公民的语言,这个世界公民的语言不能够意识形态化,如果意识形态化了,它的普遍性、公众性,被中国以外各种不同的文明接受的程度就会低。

我觉得平等互惠的对话最好。对话的目的,不是希望改变对方的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的对话常常出现这个问题,基督徒希望伊斯兰教都变成基督徒。应该在平等的氛围中间对话,彼此平等互惠,开始要互相了解,对话不是为了改变对方的信仰,假如认为对方的信仰是处于比较低阶段的,人类文明从迷信的宗教经过形而上的哲学,已经进入科学理性了,要把对方迷信的不科学的东西变成科学,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要改变对方。这个对话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排拒性。第二,对话不是为了说教,说教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论,我们强势的意识形态被误解和曲解了,说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跟他们说明,他们了解了,就会改变,你既不是为了改变对方,开始对话的基本原因不是为了改变他,不是为了宣扬我们自己的观点,也不是为了改正人家对我们的误解,对话为了什么?

第一,对话是要培养倾听的能力,我们要听,有一些宗教我们不了解,认为它完全是迷信的.但是要听它的声音,听是一种深度的听,不是泛泛的听。

第二,对话能拓展我们的知识视野,越是跟我们本质不相同的东西越有与我们对话的可能,我们视野会越来越扩大,其实也使得主流的意识形态变得更加丰富,要增强我们自己对自身信仰传统的批判能力,有些信仰可能过时了,有很多效用没有我们想象的大,有很多也许我们纯粹误解了,都要加以反思。当然,受现实种种条件的制约,要进行这种类型的对话特别难。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假如通过这样的对话,再塑造我们民族的文化认同,它的内容比较丰富;不仅它的内容比较丰富,而且它的开放性就能够保持,这当然完全是我自己一些偏颇的看法,

虽然如此,面对现在人类的存活问题,包括地球问题、社会持续发展问题、核战问题,甚至金融风暴,所有这些大的问题,人类以前没有碰到过,我们今天碰到了,我们的感受和其他人都是同等深刻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只要用自己反思的能力,能够回顾自己传统的资源我们对这些问题就有发言权。但是,也有很多的盲点,有很多的空隙,假如说我们把我们的资源当做解决现在人类所碰到的问题良方,能够像医生一样来看病,那是最大的傲慢,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这些资源,还处在开发的过程中,而这个开发的过程,我们对它的理解非常少,这中间的讨论辩论已经众说纷纭,很难达成共识,但是非做不可,这是磨炼的过程,通过碰撞磨炼,面对人类的大问题,面对西方哲学所能提供的最丰富的资源,我们可以进行对话。我们对话的目的,是互

相了解，互相参照，互相学习。所以我希望中美，或者是中西，最重要的对话，就是文明之间的核心价值的对话，当然现在还没有开始。现在很多人在做这个东西.比如说“天命之谓性”和天赋人权的关系是什么，义务的问题，自由的问题，人权的问题，个人尊严问题，社会和谐问题，法制的问题，等等：我觉得从西方所发展出来的价值，已经是普遍价值。中国、儒家也有自己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像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等，对美国社会也有很大的参考意义，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把这些观点和他们一起分享。

腾讯 <https://mp.weixin.qq.com/s/1NS61d3brik4F2T2vdaheW>